

石鼓书院

郭建衡 郭幸君 著



湖南·长沙·岳麓山·岳麓书院出版发行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石鼓书院

郭建衡 著
郭幸君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鼓书院 / 郭建衡 郭幸君 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8（2015.3）

ISBN 978-7-5561-0314-0

I. ①石… II. ①郭… ②郭… III. ①书院—介绍—衡阳市 IV. ①G649.29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7695号

石鼓书院

郭建衡 郭幸君 著

责任编辑 李 林

装帧设计 张馨尹

责任校对 丁大重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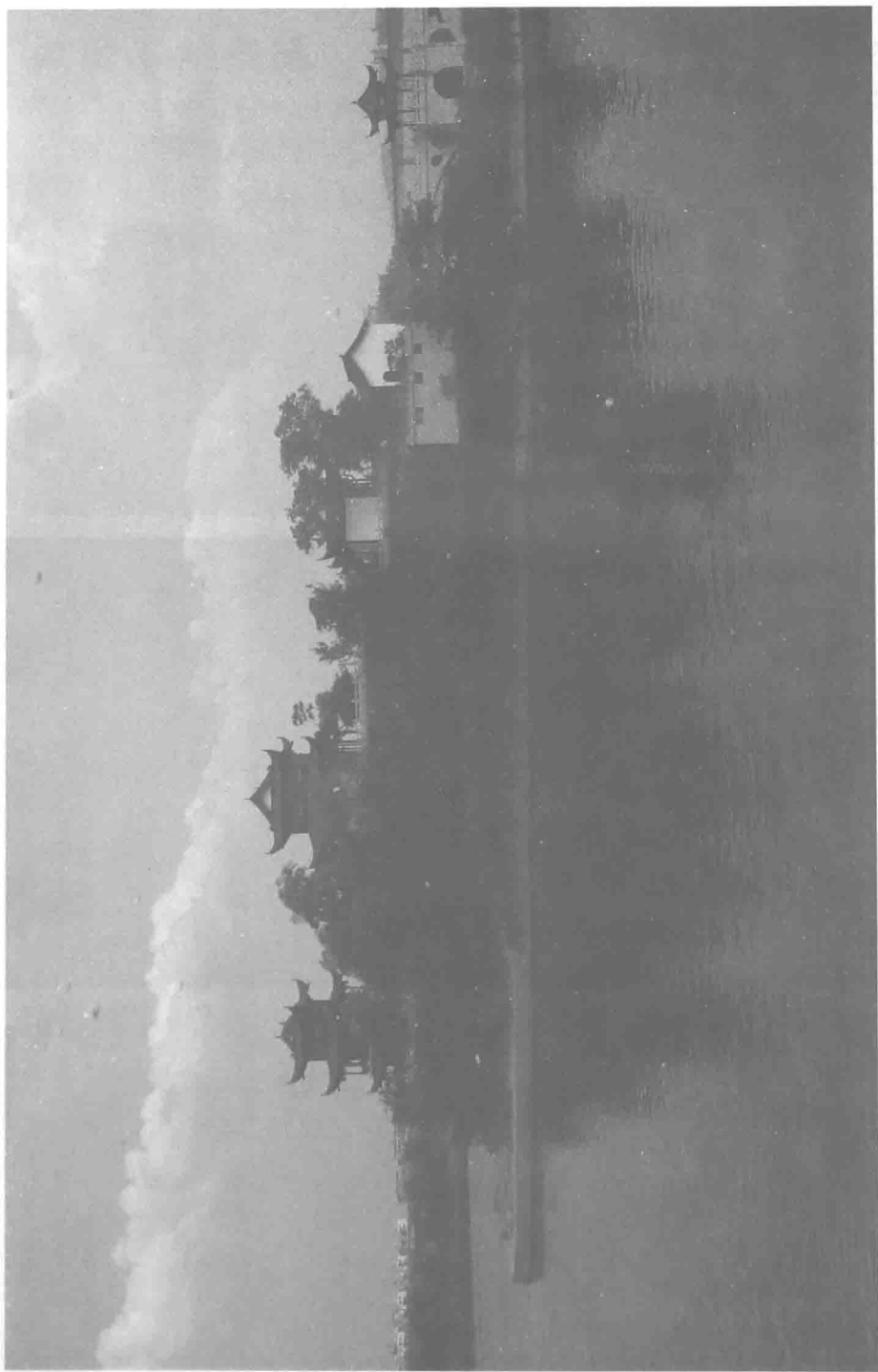
印 张 17

字 数 24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3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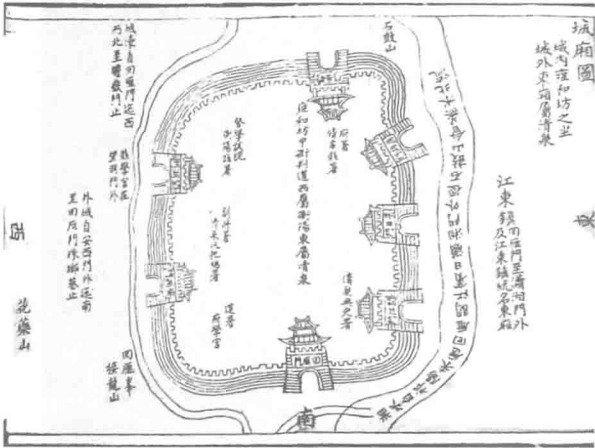
定 价 29.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2007年重修后的石鼓书院

古代石鼓书院



古时，石鼓书院在衡州城北



明万历年间石鼓书院概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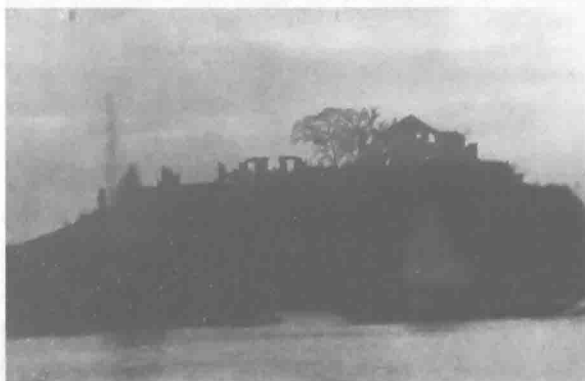
清乾隆年间石鼓书院概貌



旧时石鼓书院



民国时期的石鼓书院



1944年，石鼓书院毁于日寇炮火，成为一片废墟

曾经的石鼓公园



20世纪60年代在石鼓书院遗址辟建石鼓公园

重修后的石鼓书院



2006年6月，重修石鼓书院工程奠基，2007年9月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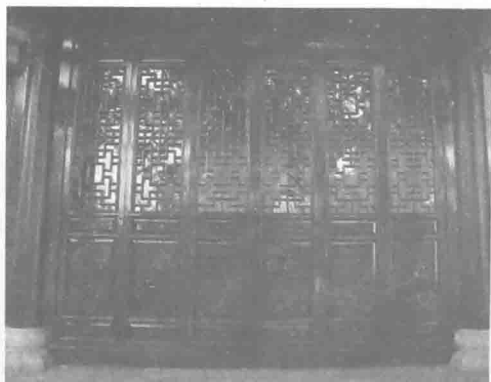
重修后的石鼓书院院舍



重修后的石鼓书院院舍



石鼓书院院舍局部



按清代中期布局重修的石鼓书院，既呈现江南古建筑风格，又融入了地方历史文化内涵



郭建衡2014年4月摄于石鼓书院

作者简介

郭建衡，1948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副研究馆员。曾任衡阳市博物馆副馆长、衡阳市文物处处长；衡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委员，湖湘文化研究所和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湖南省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船山学社理事，衡阳市船山学会副理事长，唐群英研究会副会长。

全程参与重修衡阳石鼓书院，并担任《衡阳石鼓书院重修暨建设方案》、《衡阳石鼓书院复原陈列方案》及辅助陈列《千年学府，石鼓胜迹》的编撰，在国家、省、市各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专业文章80余篇。其中《关于建立文物保护新体制的思考》获衡阳市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并收入《衡阳社会科学文库（1978—1999）》出版发行；著作《城邑沧桑》（衡阳历史文化丛书）获湖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衡阳市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郭幸君，1970年元月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大专文化，中共党员。1988年12月参加工作进入衡阳市博物馆，在馆内主要担任陈列展览设计，曾任陈列部副主任。历年来主持或参与设计制作了《一代圣哲王船山》、《耒阳历史文物陈列》、《华夏名碑“谷朗碑”》及衡阳市博物馆新馆基本陈列等多个大型陈列展览。2004年借调至衡阳市文化局工作，2014年初接受组织安排赴郴州汝城县文广新局挂职。

简述衡阳石鼓书院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代序)

衡阳石鼓书院肇创于唐代中期，未几即招徒授业。北宋时，朝廷两次颁赐敕额，名动天下；南宋时，朱熹一篇《石鼓书院记》，石鼓与岳麓、白鹿洞书院以“天下三书院”成为中国古代书院的楷模，旋又以“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天下扬名，一直传颂至今。笔者2008年发表的《李宽与李宽中秀才书院》一文结尾中提出：“石鼓书院在中国古代书院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都必须重新审视和挖掘，仅仅津津乐道于创建时间早是远远不够的。”值此拙作《石鼓书院》面世之际，笔者对衡阳石鼓书院在中国古代书院和湖湘大地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作一简略的阐述，并代序。

一、衡阳石鼓书院是最早具有教学职能的古代书院

中国古代书院之名始于唐代，肇始之初，并不具备教学职能。其时，官方书院是“修书之地”，主要职能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以备顾问应对”，同时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民间书院则由学人、士子的书堂、书舍和书楼等易名而来，其性质仍然是私人读书和交会文友的场所。

关于中国古代书院何时开始招徒授业，也就是何时开始成为具有教学职能的教育机构，很长一段时间存在“始于晚唐五代”和“始于宋代”等说法。近些年来，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书院研究的不断深入，“始于唐代中期前后”的观点逐渐凸现。具体来说有福建漳州龙溪松洲书院、第四郎书院（或称薛载少府书院）、江西洪州高安桂岩书院等。据笔者考证

(详见《衡阳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石鼓书院是中国最早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唐中宗景龙二年(708),陈珣(680—742)以主漳州文学的身份创办乡学(后人称之为松洲书院),曾举办以移风易俗为主旨的社会讲学,类似现今书院面向社会的讲座,与正式招徒授业有别。第四郎书院约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前后,实为个人攻读的书屋。桂岩书院正式招徒授业在唐宪宗元和九年(814)之后若干年。

石鼓书院的前身李宽中秀才书院肇创于唐元和三年(808),始称读书堂,未几改称书院。元和五年(810),衡州刺史、“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吕温探访并题诗《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为李宽(一称李宽中)及其书院作了极好的宣传和推介,而且迅即引起社会尤其是士子学人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一时间登门拜访和慕名求学者接踵而至。李宽中秀才书院的性质亦由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私人读书地顺应民情转变为招徒授业,成为中国古代书院最早具有教学职能的民间教育机构。

二、衡阳石鼓书院是湖湘文化创立和传播的重要阵地

衡岳大地是湖湘学派的发祥地,奠基人和开创者为胡安国(1074—1138)、胡宏(1105—1155)父子。胡氏父子在衡岳大地著书立说、开坛讲学,构建了湖湘学派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学说宗旨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将儒家义理与康济时艰紧密结合在一起,由是亦成为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

胡氏父子在衡岳大地的学术活动,对学氛甚浓的衡阳石鼓书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于张栻、朱熹而愈加彰显。张栻(1133—1180),字钦夫,号南轩,是胡宏的高足,湖湘学派的杰出代表。张栻尝讲学石鼓书院,传授湖湘之学,并为石鼓书院撰写《武侯祠记》、《风雩亭赋》,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勒碑立于石鼓山合江亭。朱熹(1130—1200)对胡氏之学倾心已久,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到潭州岳麓书院寻访张栻,系“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朱、张在岳麓书院同坛讲论,相互质证,时间长达二月有余,不仅开中国古代书院不同学派会讲之先河,而且使得湖湘学与闽学相互交融,相得益彰。据载朱熹亦曾在石鼓书院讲学,并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撰《石鼓书院记》。胡氏之学的传承和发扬,使得衡阳石鼓书院为湖湘文化的确立和传播

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湖湘文化确立和传播的重要阵地。自宋以降，衡阳石鼓书院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济世之才，他们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在践行湖湘文化核心理念的同时，推动湖湘文化在更大范围的传播和传承，为社会发展作了积极的贡献。其中，清咸丰、同治年间随着湘军集团崛起脱颖而出的彭玉麟，以卓著的军功政绩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同列清“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使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即爱国主义和经世思想得到极大的张扬，成为湖湘文化又一杰出代表。

三、衡阳石鼓书院是衡州地区最高学府

衡阳至唐代时仍为荒蛮之地，有唐一代衡州刺史多为朝廷贬官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尽管夏商以降，中国就有教书育人的学校，诚如《汉书·儒林传序》所云：“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但衡阳方志关于唐代学校的记载，仅有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衡山县令陆氏首兴庙学（按：即县学，因无学舍，借庙宇作为讲学场所，故称）一例。陆令此举引起了杜甫（712—770）的极大感叹和赞赏，其《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诗中称“衡山邑虽小，首唱恢大义”。然而杜甫于代宗大历（766—779）初两至衡州，诗文中却从未提及衡州及衡阳县的学校，其时衡州及衡阳县有无学校无从稽考。由是，肇创于唐元和三年（808）并于元和五、六年间（810—811）即招徒授业的李宽中秀才书院，很可能是衡州城及衡阳县唯一的教育机构。

进入宋代，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石鼓书院，不久即以衡州州学立世。宋淳熙十三年（1186），邑人廖行之（1137—1189）撰《石鼓书院田记》称：“某退而稽寻颠末，盖石鼓旧有书堂，祥符初元奉夫子庙迁焉，书院之名始著。景祐三年诏许衡州立学，自是为学宫，书院因废不别建也。”依廖行之所言，太宗祥符初元（1008）将孔夫子庙迁附于石鼓书院，而“宋明以来，孔子祀学宫”（引自清同治《衡阳县志·礼典》），学宫指官府所置州、县学，则石鼓书院于祥符初元当已视为衡州州学，距李士真重建书院才11年。有宋一代，石鼓书院一直作为衡州最高学府即州学，直到南宋末才有了改变。明嘉靖《衡州府志·卷五·学校》云：“衡州府学在府治南。旧在石鼓书院西，谓之双学。宋末毁于兵燹，衡守以官

居易古塔寺地重建，宋无名氏记。元至正间为寺僧所夺，后买宋故安抚使李芾宅建。”

尽管南宋末石鼓书院与衡州州学分置，但其后地方官员莅衡赴任、上级官员视事衡州，多首先到石鼓书院；不少官员抵衡赴任或视事的前夕，还夜宿石鼓书院，谋划修葺，兴盛学脉，无不雄辩地证明，石鼓书院在官绅、士子心目中的地位仍然是极其崇高的。由是，历朝各代，州县、院司，各级官吏仍将石鼓书院视同官学，对其格外眷顾，甚至将加意扶植石鼓书院作为职守要务，且先于扶植衡州府学。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朝廷析衡阳县东南置清泉县，尽管石鼓书院在衡阳县境内，仍由衡州府率衡阳、清泉两县共管，此种殊荣是衡州府学亦不能企及的。正因为如此，石鼓书院千百年来经久不衰，不仅衡州所辖各县诸生趋之若鹜，而且长沙、永州诸郡士子“皆负笈来学”，“洋洋衡湘石鼓之上，宛然一邹鲁洙泗之风也”。

四、衡阳石鼓书院引领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

衡阳石鼓书院是中国最早创建的古代书院之一。当最早的一批书院仍处于个人攻读的低级阶段时，石鼓书院的前身李宽中秀才书院却因为历史的机缘一蹴而成为正式招徒授业的具有教学职能的民间教育机构。李宽中秀才书院办学“多士景从”的兴盛气象声名远播，对中国古代书院实现由私人究学场所到民间教育机构的历史性转变，起到了极为重要甚至难以估量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宋代天下“三大书院”或“四大书院”中，衡阳石鼓书院创建最早，而且是唯一由宋太宗、仁宗两代皇帝颁赐敕额的书院，其影响一直延续至明、清，成为后世建设书院和书院建设的楷模和典范。理学宗师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倡导的以义理之学授徒、书院教育要重践履、穷理而笃行等，成为中国古代书院共同遵循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原则。

在改朝换代的战乱年代，古代书院难逃毁于兵燹的厄运。新兴王朝初立时，对思想言论实行严厉的控制，学术空气活跃开放的古代书院因此受到压制甚至禁绝，往往造成全国书院一片沉寂的局面。而历史上享有盛誉的衡阳石鼓书院，常常以其迅即重修率先打破这种沉寂，促使朝廷高压、抑制政策松动，成为全国书院复苏的信号。明初、清初无一例外，而元初